

2013年是“走出去”的最好时期,也是矛盾爆发期。中国企业走向海外,要做到“五个选对”,才能避免风险。

魏建国：企业“走出去”要选对项目与环境

——专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

■ 本报记者 蒋皓

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什么形势?需要注意什么?

《中国企业报》记者带着相关的问题,走进有中国“最高级别智库”之称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试图寻找答案。以下是对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的访谈。



魏建国

“起步晚、发展快、潜力大、前景好”

《中国企业报》:您在海外工作数十年,后来在商务部负责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工作,对于中国企业走出去可以说是最有发言权的,您怎样看待走出去的形势?

魏建国: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经验,我认为可以总结为4句话——起步晚、发展快、潜力大、前景好。为什么说它起步晚呢?开始的时候并没有国外这一块。2008年金融危机刚开始的时候,我提出过当前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最好时机。

我曾经参与了联想收购IBMPC的项目,当时感觉特难,因为竞争激烈。我征求过许多人的意见,最后还是同意了我的意见,就是去做。现在事实证明,做是对的。联想海外走出去的这一仗打得很成功,柳传志、杨元庆都很感激。我还参与了李东升的TCL收购法国汤姆森、吉利收购沃尔沃,包括上海在俄罗斯的波罗的海明珠大项目。起步晚,但是发展快,华为中心找我的时候是上世纪末,不到十几年的工夫,就把国内外的市场比例,从三七开变成了倒三七,以前是七分在国内,现在是国外占七分,国内是三分。

企业真正能赚钱的还是在海外,在国内有时候很难。我们在非洲有大概2400多家公司,接手的合同有2000多个,港口基础设施、飞机场、铁路、医院、学校建设做得非常好。因为了解国

外情况,熟悉国外法律,精通当地的语言,同时具有国际大的合作思路 and 战略,所以虽然起步晚,发展是快的。

发展快的例子不胜枚举,中国还有更大的潜力。中国要走实体经济,要避免贸易的摩擦,减少国内重复建设,转移多余的劳动生产力和设备,这些都是可以通过走出去解决的,通过走出去达到互利共赢。

《中国企业报》:对于2013年走出去的形势您有什么样的估计?

魏建国:2013年是“走出去”的最好时期,也是重点时期。我们投资的重点领域要逐步转向旅游、卫生、环保。我们现在接受外资一直是发展中国家的第一,今年达到1100—1200多亿,我们到国外的才600多亿。一个国家要强大,对外的投资必须比吸收外资多。一个国家的进口要比出口多,他才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出口和进口并重,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在这样的形势下,我认为,现在的外贸出口,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特别是加大服务贸易方面。在进口方面,如果我们要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需要更加积极地扩大进口战略。

当前,我们要扩大进口的地区,不仅要进口发达国家的产

企业要做到“五个选对”

《中国企业报》:如果给中国企业目前走出去的成绩打分,您能打多少分?针对中国企业自身的努力来说,要怎样才能更好地走出去?

魏建国:现在给走出去打分也只能打60—70多分,这个成绩以后还会有很大的提高的余地。现在走出去的企业1/3是赚钱的,1/3是平的,1/3是亏损的。

我觉得企业走出去,要做到五个选对,第一,要选对自己擅长的项目。对方愿意接受的项目,比如你是搞基础建设,还是搞洗衣机流水线、制鞋、服装,不然你本来搞进出口贸易,结果去搞投资,这不是你的强项,那肯定要失败。第二,要选对市场。这个市场必须对你的产品有“容纳”,比如说比尔·盖茨的windows、苹果的iphone、韩国的三星,由于选择了中国市场,就发展得很快。第三,一定要选对贸易或投资合作伙伴。利比亚就是一个教训,很多时候都是合作伙伴带着我们的队伍,最后撤出来了。第四,选中选好一个互利共赢、合作发展的原则,不要在乎小钱,眼前利益,是发展不快的。第五,就是选中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避免政权更迭,要避免损失。

选对这五个,在哪都能生存。我们不要回避,要面对现实,才能更好地发展。在这里,政府的作用就很重要。企业要了解国外的市场、国外的情况,我们驻外的机构,要帮助企业把好这一关,因为他们最了解所驻的这个国家需要什么,愿意发展什么,是缺钱?还是缺智力?缺劳力?还需进一步了解所

需要的法律、外汇、贷款等合作伙伴支持。最后在选择伙伴的时候,要摸清他的信用、信誉、资金情况。这样对中小企业来说,能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最大限度地避免损失。

另外,企业“走出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我们的服务。按售前占三,售后占七的标准看,服务这一块恐怕做得不够。奇瑞、沃尔沃、吉利、华为、中兴,这些走出去的企业,取得成功最大的经验是在服务上。

政府应着力确保“三个平等”

《中国企业报》:您刚才提到了政府的作用很重要,那么除了企业自身的努力,政府如何帮助中国企业走得稳?

魏建国:我迫切希望国家能够在解决中小企业问题上出台相关政策,最重要的是如何解决三个平等问题,即权利平等、规则平等、法律平等。我认为,目前最需要研究的是贷款政策、金融保险政策、企业“走出去”的优惠政策以及中小企业自身科研发展的支持政策。当前,传统产业如果不转型升级,下一步很难提高和发展。中小企业其实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弱项,但是却得不到贷款和政策方面的支持,如果这些方面能够解决,那么中小企业会出现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迸发出更大的动力。

中国的中小企业,要抱团“走出去”。由国家派出,对方政府拿出一块地,由商务部负责“走出去”。我们在巴基斯坦、印度、非洲、俄罗斯都是成批的。1.5公里、2公里范围内的企业集中起来,由我们来管理,我们来办签证,由政府提供“三通一平”,由政府来服务,企业入驻厂房,请了警察、保安。这样避开了当地对我们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干扰和骚乱,产品也有专门运输,包括水路、公路和铁路。

远见

2013,靠什么拉动中国经济?

■ 孟书强

2012年的宏观经济数据日前相继公布,结果既不像有些人预测的那么悲观,也没有一些人想象的那样乐观,可谓是冬日里有春意,繁荣中有萧瑟。2012年已然离我们远去,不过2012年的经济走向却仍在延续。分析宏观经济数据背后的内容,对我们理解2013年乃至未来更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经济的根本动力不无益处。

2012年,中国经济之路也算得上是“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又遇打头风”了。在世界经济普遍低迷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发展长期依赖的重要支柱之一——出口遭受了相当的冲击。最新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出口较2011年增长7.9%,增幅远低于2011年的20.3%。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由“三驾马车”逐步转为“双轮驱动”,即由出口、投资和消费共同拉动转向由投资和消费拉动。换言之,此前由“出口—投资”拉动的高增长已经不可持续,不得不向“投资—消费”的内循环转换,但这种转换显然还需要一段时间。提高公众收入水平、建设高水平社保体系、大幅缩小收入差距等促进消费的三大问题在短期内显然无法彻底解决。

尽管依靠政府主导的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遭受到越来越多质疑,相当多的经济学家开始猛烈抨击这种发展模式,但2012年稳增长背景下的实体经济的困境还是再度催生了投资倾向的抬头。据不完全统

计,2012年的最后一个月,国家发改委公布重大项目通过审核项目名已达94个。而此前的11月份共审核通过17个项目,10月份通过75个项目,9月份则高达147个项目。

2013年,国内的出口、投资和消费形势可能在很大程度上还会依然延续2012年的形势。考虑到美国经济的表现可能强于预期,并且欧洲经济形势将持稳,中国2013年的出口增长速度虽可能会略有提升,但仍不会出现明显好转。野村证券的分析师张智威就表示,考虑到欧美形势的不确定性,目前仍很难断定中国2013年贸易额会有大幅回升。他预计,中国2013年出口将仅增长5%。

不过在投资和消费方面仍然有不少乐观因素值得期待。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要把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重要任务抓实抓好,这对促进投资和消费都有重要意义。城镇化是当代中国增加投资和扩大内需的重要载体,每一个百分点的城镇化率,对应的是上千万人口和数以万亿元计的投资和消费。由发改委主导的《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规划(2011—2020年)》初稿称,“城镇化在未来十年拉动40万亿投资”,估计2013年大量资金将进入这一领域。另据测算,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只有城镇居民的1/4至1/3,农民进城以后,一个人每年至少比在农村多消费1万元,按照每年1000万人进城计算,每年直接拉动内

需就达1000亿元。

此外,几度难产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也极可能在2013年顺利和世人见面。长期以来,我国居民消费不足,很大程度上和收入分配方式有关。十八大报告提出,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这可看做收入分

配改革方案的指导精神,据此我们也应对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在促进消费上的作用抱有一份乐观。

正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指出的,目前整个世界经济处在危机型的快速发展期,并进入到危机后的深度转型调整期,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仍然需要面对相对低迷的全球经济增长,如何依靠投资和消费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可能是中国2013年经济增长面临的主要问题。



热点



停止财富缩水 消除养老金上涨的隐忧

“

不可否认,中国货币供应量的增速已经远高于正常的范围,因而在某种程度上恶化了收入分配的情况。如果物价总体上涨,而货币供应量的增速又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则人民币未来购买力继续贬值的趋势也将不会改变,这将使人们手中的财富加速缩水,也会使中国的养老问题变得更加严峻。

■ 丁是钉

按常理来说,涨工资总是一件好事。然而,在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上涨10%的消息公布后,人们普遍感到的不是收入的增加,而是财富的缩水。这种对于未来财富水平和养老能力的忧虑,让那些已经退休的人和迟早要退休的人都高兴不起来。

未来我们拿什么养老?这个问题拨动着人们最敏感的神经。首先,从2005年以来,国家已经连续第9年调整企业养老金,而企业退休人员的生活水平非但没有明显好转,相反却有下降趋势。替代率是衡量退休人员生活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这个指标是指劳动者退休时,养老金领取水平与退休前工资收入水平之间的比率。现实是,养老金替代率从最高时的80%以上,已经下降到目前的40%左右。这种基于通货膨胀的养老金上调,让人们对于未来的生活充满担忧:如果物价还会持续上涨,而国家不再给企业退休人员涨工资该怎么办呢?

同时,去年关于提高企业退休人员退休年龄的议论,让更多的人知道国家未来给我们养老钱,已经出现了很多的缺口。如果养老金持续上涨,那么,势必会更快地消耗掉养老金池中的存量资金,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更悲观的。

相关研究表明,2010年我国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特点是收大于支,但是支的增长速度大于收。2001年以来,在覆盖的城镇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职工中,参保人数平均增速为4.04%,已经低于离退休职工人数的平均增速6.64%。养老金收小于支会持续下去,这意味着全国养老保险收支出现赤字并非遥远的事。

而老龄化趋势也是养老金所必须面对的另外一个难题。我国15—59岁的劳动人口,2010年已经是顶点了,35岁以下的人口2003年、2004年已经开始减少,这和过去的劳动年龄人口在人口红利的高峰期较快增长,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在中国,老年人口到2050年预计将达到4.3亿,占总人口超过30%。2050年每3个中国人中就有1个老人。与此相对应的是,我国从2001年进入老龄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7%;2010年老年人口统计赡养比10:1,实际5:1;2020年深度老龄化,统计老年赡养比5:1,实际3:1;2050年老龄峰值,统计赡养比2:1,实际不足1:1。

从简单的逻辑上看,要解决养老金不足的问题,只有两个出路:一个出路是增加养老保险的收取比例,但是,从企业和员工个人的支付能力上看,我国的养老保险缴存比例已经接近极限,如果企业和劳动者创造财富的能力不发生突变式的提高,增加养老保险缴存比例的空间极其有限。另一出路是降低养老金支付水平,一方面是直接降低养老金支付数额,这涉及大量老年人口的基本生活保障问题,几乎没有可行性;另一方面是提高退休年龄,减少养老金的实际支付年限,这一方面是政府的违约风险,另外,我国人口的平均年龄明显低于美欧等国,如果和美欧采用同样的退休年龄标准,实际上对劳动者是不公平的。

如此看来,解决中国人未来的养老问题似乎已经无路可走。但分析造成目前养老困境的原因,我们就会发现,是持续的通货膨胀让居民财富包括养老金池中存量大幅缩水。比较近10余年的平均通胀率,中国和美国、德国等几大经济体差别并不大,而货币的实际购买力却大不相同。近10年来,无论是欧元,还是美元的购买力,和10年前并没有太大的差别,但现在的100元人民币和10年前的100元比,实际购买力差别很明显。2011年,中国的GDP规模为47万亿,是1978年3645亿GDP规模的128倍。广义货币供应量却从1978年的859.45亿元增长到2011年底的85.2万亿元,为991倍。货币供应量增速高于GDP增速的7.7倍。用人民银行前副行长吴晓灵的话说,“过去30年,我们是以超量的货币供给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

不可否认,中国货币供应量的增速已经远高于正常的范围,因而在某种程度上恶化了收入分配的情况。如果物价总体上涨,而货币供应量的增速又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则人民币未来购买力继续贬值的趋势也将不会改变,这将使人们手中的财富加速缩水,也会使中国的养老问题变得更加严峻。

改变以通货膨胀刺激经济增长的思路,改变为应对通货膨胀被动增加工资水平的做法,让人们已经获得的财富不再持续的、大幅度的缩水,消除人们对于未来财富不确定性的恐慌,这一定是解决中国养老问题的基础。